

“后人口转变论”^{*} 质疑

——兼与于学军、李建民博士商榷

李建新

【内容摘要】 本文就于学军、李建民博士的“后人口转变论”提出了质疑；对“后人口转变论”一文进行了较详细的解剖和评论。现阶段中国人口是否进入了“后时代”，“后人口转变论”是否形成了对传统人口转变论的突破和超越，是否建构起了新的人口理论，本文对此作了回答。

【作者简介】 李建新，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邮编：100871

1 引言

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时期。与此同时，人口学界也非常活跃，各种新观点、新理论纷纷推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我国新世纪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问题、人口政策等。这其中以“中国人口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后人口转变论”等较为引人注目，并引起广泛的争议。虽然有关西方“后”（post）的理论以及学说在我国社会学、哲学领域兴起已近十来年了，但进入人口学领域并试图形成一种理论或学说则是近一、两年的事。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提出质疑，然后再提出对“后人口转变论”的一些看法及观点，最后笔者从另一个视角，从西方“后学”的内涵、理论再简略地审视一下“后”在人口学中的含义。

2 关于“中国人口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中国人口自 90 年代以来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即低于更替水平）时期，关于这一点大体上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是进入了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于学军、李建民分别著文^{1,2}，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那么，后人口转变的标志是什么呢？李建民在通过与发达国家人口统计指标进行了比较之后，判定我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指出，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走向零增长和人口结构性变动成为调节人口增长态势的主要因素已经在我国人口中开始显现。也就是说，李建民是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对中国人口进行“后”的划分的；于学军则从统计指标（主要是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上对我国进入“后转变”做出了判断。他指出，之所以说 90 年代中国人口发展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是因为 90 年代后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众所周知，人口转变论是 20 世纪初西方学者从总结西方人口变动的历史经验，从描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开始的。二战以后，人口转变理论不仅在统计描述上

* 有关“后现代理论”笔者与本所赵旭东博士进行了交流，受益非浅，特此表示感谢。

进一步规范,而且更侧重于人口转变的机制、动因以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说人口转变理论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人口统计变量如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描述和形式表现;二是这种变化、表现的实质分析和解释。西方人口转变理论实质上是人口统计形式描述与人口变化本质解释的统一。因此,判断一个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并进入“后时代”,仅以人口统计指标一个方面来判别,笔者以为是够充分的,应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判断。人口统计指标仅仅是判断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不是人口转变的这种指标表现形式,而是人口转变的本质变化的判断,是人口转变背后的动因变化的判断。因此,从这个视角出发,笔者以为李建民单以人口统计指标作为后人口转变的标准,显得不够充分。我们注意到,于学军在其文“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以下简称“于文”)中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从人口转变的本质如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指标来界定。显然,这种从两个方面的判断思路是比较完备的,但问题是这种关于生育意愿判断的根据是不是很充分,是不是仅有这些判断就够了,笔者对此有所疑问。

“于文”为了证明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首先提出了生育意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判断。这种判断的根据是来自两次全国性抽样调查的结果。结果显示,整个90年代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水平以及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在逐步接近。且不说这种调查结果可信度如何,单以这种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反映一个人口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中国这种强生育政策背景之下的生育意愿)并得出结论,这似乎很缺乏说服力。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都与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有关,在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尤为如此。如果生育观念或生育文化没有质的变革,很难推出生育意愿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要判断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的变化,事实上是要判断中国占据总人口60-70%的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的改变。在这方面恐怕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更令人信服。一些研究指出^{3,4},目前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仍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仍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之中。如果是这样,生育意愿又怎么可能独立于生育观念、生育文化而发生质的变迁呢?^{**}

“于文”虽然考虑了以生育意愿来表明中国人口转变的本质变化,但单以这一指标衡量是不够的。西方学者把人口转变看作是发展或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变革的产物,因此,判断我国人口转变是否彻底、是否完成,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一项有关中国现代化程度的研究指出^{**},1998年在120个国家中,中国综合排名第66位,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10项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中,有关人口转变的指标,如人口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等均在前列,而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如人均国民产值、产业结构、城市化、高等教育水平等处在后列。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人口转变的确在人口数量指标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却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人口转变超前于“发展”与“现代化”水平。既然人口转变的根基并不稳固、并不坚实,我们就很难断言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而开始进入了一个“后阶段”。事实上,正是由于人口转变的这种超前性,才隐含着人口转变的不彻底性、不稳定性,也才需要政府继续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干预。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人口转变尚未彻底完成,仍还需进一步努力。

总之,笔者并不以为“中国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因为,仅以人口变量统计指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并进入“后时代”,是不够充分的;尽

^{**} 朱庆芳“‘现代化’没那么容易”,北京青年报,2000年4月7日,第18版。

管于学军试图证明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判断证据显得比较单薄,缺乏说服力。因此,中国人口转变充其量是在统计指标上、在表现形式上进入了所谓“后人口转变”时期,而本质上、内容上还处在人口转变之中,还处在人口与“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转变之中。这正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从而促进人口彻底转变的意义所在。

3 关于“后人口转变论”

李建民在判定中国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之后,又提出了“后人口转变论”,力图从理论的高度建立一个分析人口转变的新框架⁵。李建民发表在《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后人口转变论”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口转变已经结束的国家的国家的人口发展已经走出了人口转变理论的视野,“后人口转变论”的提出是旨在建立一个涵容性更强、视野更广阔的人口长期发展理论的框架。“李文”首先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人口转变论的理论局限。其一,人口转变论的理论重点在于人口转变过程,而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发展趋势及特点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其二,人口转变论没有涉及人口转变过程与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之间的关系;其三,人口转变论没有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人口增长趋势影响的问题。由于人口转变论存在着上述局限,“李文”认为,这种局限给人口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建立一个包括后人口转变阶段在内的人口长期发展理论。

一门新的理论的建立,必须在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某一个或多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人口学这门西方发展起来的学科通常被人口学家区分为“人口统计分析(Demographic analysis)”和“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前者是关于人口和人口变量诸要素的研究,后者则不仅涉及人口变量,还涉及人口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狭义人口学”可以理解为人口统计分析,不加定语修饰的“人口学”;“广义人口学”则包括上述两个部分。人口统计学又可以看作是人口学的核心⁶。李建民从“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判断到“后人口转变论”的建立,事实上都出自于狭义人口学同一个视角,即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在这种视角之下,李文指出人口转变论的局限,力图从研究内容也就是从人口转变完成之后的人口发展趋势以及人口变量之间(如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人口变动等)的关系上超越和发展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而建立新的理论即“后人口转变理论”。问题是从研究内容上我们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去超越、发展并建立所谓“后人口转变论”?笔者持怀疑态度。下面我们逐一来考察所谓人口转变论的局限以及试图弥补这种局限的研究内容。

3.1 关于人口转变论的三个局限

为了能与李建民保持同一个争论的视角,以下的分析和讨论也是在狭义人口学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狭义人口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美国人口学家内森·凯菲茨(Nathan Keyfitz)1985年的第二版《应用数理人口学》(Applied Mathematical Demography),这本著作被不少西方人口学者称为人口学定量分析的“圣经”⁷。在这本“圣经”中,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可以找到“人口转变论的理论局限”所要的答案。事实上,联合国人口机构一直都很关注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一直借用模型生命表、稳定人口理论、人口预测方法等对世界、对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对正在发生人口转变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人口趋势及其特点包括三种发展变化走向(低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我国自70年代人口学兴起之后,特别是80年代之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人口预测都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80年代初,宋健、于景元等研究员利用控制论、数学

模型对我国人口未来进行了预测；90年代初，曾毅教授采用城乡人口动态预测模型，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学变量，如生育率模式、平均生育年龄、城乡人口迁移等，对未来中国人口（包括人口转变之后的人口态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充分地比较了各种可能的人口发展趋势、特点以及利弊，提出了有政策价值的方案选择。90年代以后，中国诸多学者（包括李建民和笔者）又利用普查数据，利用人口预测软件，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50年或100年）及特点进行了多种模拟和研究。由此可见，在狭义人口学中，利用数理分析模型、预测方法等，中外学者对人口更长期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研究。

“李文”中关于人口转变论的第二个局限是指转变论没有涉及人口变化过程中（包括转变和后转变）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然，人口各要素，如出生、死亡、年龄结构、迁移等以及相互关系都是狭义人口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正如“李文”指出，先发人口转变国家与后发人口转变国家在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笔者以为，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口转变的初始条件不同以及转变过程中人口各要素的变化特点不同所致。凯菲茨在比较了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人口转变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之后，发现除所有国家人口转变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以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滞后效应，也就是出生率滞后于死亡率下降而带来的人口高增长效应。凯菲茨还对这种滞后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出生率下降滞后时间越长，变化幅度越大，总人口的高增长效应也越大⁷。因此，与发达国家那种自发的、缓慢的人口转变相比，后发的人口转变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凯菲茨的分析视角，笔者不完全同意“李文”中把中国和日本、新加坡等笼统地归为后发人口转变国家一类。笔者以为，战后的人口转变即后发人口转变至少大体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本、新加坡等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战后其人口转变历时短，出生率、死亡率下降迅速且基本上不存在出生率下降的滞后效应。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人口死亡率从1947年的14.6‰迅速下降到1955年7.8‰，同期出生率也由34.3‰下降到19.4‰，总和生育率也由4.54下降到2.37，人口转变进入了“三低”阶段。此后20年即到1975年，总和生育率一直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正负误差差不超过0.15，除个别年份如1966年），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左右的水平。并没有出现如“李文”所指出的“人口变动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将）表现出较大的波动。”第二类是中国人口转变。就死亡率、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而言，中国人口转变无疑是迅速的，但出生率的下降是滞后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迅速降到了1957年的10.8‰，不到10年里，人口死亡率降了近50%。而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除个别年份以外均在30‰以上）直到70年代初。7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出现了迅速下降，出生率由1969年的34.11‰迅速下降到了1979年的17.82‰，总和生育率同期也由5.7下降到2.7。与日本出生率同步迅速的下降相比，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了20年。当然，这种滞后有其人口自身变动的必然性，也有非人口学的人为因素。此外，中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有着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而不是一种自发的结果，因此存在着如“李文”所指出的“人口变动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将）表现出较大的波动”。第三类是不含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存在着明显的出生率下降的滞后效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是死亡率下降迅速，而出生率下降滞后且缓慢。以印度为例，印度人口从1950年到20世纪末历时近50年，出生率才从44‰将到了25‰，半个世纪下降不到50%，比起中国、日本10年间出生率便下降了50%的速度，的确是缓慢滞后。因此，印度人口的滞后效应也很明显，人口数量增长潜力大，并将在21世纪上半叶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人口大国。可见,“李文”所指出人口转变论的局限或缺失在数理人口学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李文”中指出人口转变论的第三个局限是指转变论“没有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人口增长趋势影响的问题”。实际上,人口年龄结构一直是人口统计学、数理人口学所关注的变量。早在19世纪末,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便根据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把人口划分为增长型、静止型和缩减型,重视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6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寇尔在模型生命表研究中,曾就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趋势的影响即人口惯性影响又一次引起数理人口学的广泛关注。凯菲茨在其论著中指出,快速增长人口的年龄构成有利于增长而产生的人口增长惯性,推导出了最终静止人口与开始下降时期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发展趋势的定量影响,并且对南美一些人口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应用研究⁷。中国人口由于基数大,即使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以下,惯性增长带来的人口净增长也很大。陈卫曾在90年代初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趋势的影响作了细致的研究。他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口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在一定的人口变量假定条件下,还要经过40年的惯性增长方可停止人口净增长,并进入人口负增长。而各个省份由于人口初始条件以及今后变化幅度不同,人口惯性增长的年限也有所不同⁸。事实上,人口年龄结构对各个国家的人口变动趋势的影响都是存在的,之所以没有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引起关注,是因为人口惯性增长并不产生新的人口压力。以日本为例,日本人口生育水平在1957年下降到总和生育率2.04,此后近20年一直保持在2.0左右,1975年以后,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以下,到1997年更是降到1.4以下。与此同时,日本人口一直处在惯性增长之中,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这种惯性增长将持续到2008年⁹。也就是说,日本人口在生育水平降到更替水平或以下之后,人口惯性增长持续了50年,由于日本人口基数并不很庞大,加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所以人口惯性增长没有带来新的压力。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生育水平稳定到很低的水平甚至还继续下降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年龄老化的人口对自身总人口变动趋势的影响(各种预测方案模拟本身就包含了对年龄结构影响的考虑)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西方人口学不乏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在人口政策上采取了相应的积极的措施。因此,人口转变论中没有关注的这些问题,在人口统计分析中、在数理人口学中、在人口发展趋势的具体预测中,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李文”中关于人口转变论的三个局限,与其说是局限、不足,不如说是人口转变论的一种界限,因为这些局限和缺失都是狭义人口学或数理人口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这样,试图弥补这些局限、超越这些不足就显得不大可能、显得不十分必要,因而,建立“后人口转变论”既失去了根基,也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在“李文”随后的第二部分后人口转变论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内容还是关于准均衡与稳定均衡的划分,都没有超越数理人口学所关注过的研究内容。

3.2 关于稳定均衡状态的“矛盾”质疑

“李文”在确定理想人口稳定均衡状态时,提出了三对矛盾,但笔者以为,其中两对矛盾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李文”指出:“矛盾之二:规模的适度和规模的稳定或静止也不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形成一个稳定人口的条件是年龄别生育率和年龄别死亡率长期不变,且没有迁入迁出。稳定人口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与年龄构成恒定不变。也就是说,稳定人口的年龄构成与“三率”完全取决于长期不变的

年龄别生育率、死亡率，而与它过去的年龄构成无关，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稳定人口忘记其过去¹⁰。稳定人口有三种状态，即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零（稳定增长人口）、等于零（静止人口）和小于零（稳定递减人口），无论是哪一种状态，只要是稳定人口，其年龄结构必然是恒定不变的。因此，规模稳定或静止（人口）必定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恒定不变，既然是恒定不变的也就不会存在所谓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至少对一个最终追求静止人口的目标是这样。同样，“李文”在矛盾之三中又指出：“即使是在适度人口规模上实现了零增长，仍然可能出现年龄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这里“实现了零增长”，笔者以为是实现了静止人口的含义，如果这种推测没有错的话，依据稳定人口理论，静止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恒定不变的常数。我们知道，所谓人口年龄结构合理不合理总是相对而言的，如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或不合理。但如果年龄结构已成为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那么，就不是年龄结构相对于其它东西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其它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于一个固定不变的年龄结构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样一来，如果在适度人口规模上实现了零增长，也就不可能出现年龄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

“李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最优人口假说，“即人口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在更替生育率水平条件下实现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稳定或静止状态。换言之，后人口转变时代的人口稳定均衡有两个基本条件：代际规模的零增长和人口规模的零增长。只有在这种稳定均衡条件之下，一个人口才能真正实现适度人口规模与合理年龄结构的统一，或可称其为‘最优人口’。”关于这段叙述，笔者有多处疑问。首先，这个最优人口假说是含糊的，是不是只要在更替水平条件之下，就可达到最优。按照上述逻辑，能不能推出中国人口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提升当前低于更替生育水平至更替水平并保持不变以最终实现的静止人口状态呢？显然这是一个问号。这里实际上出现了李建民博士自己在文中提出的一个矛盾，“即静止状态下的规模也不一定适度。”其二是关于人口稳定均衡的两个基本条件。“李文”没有给出“代际规模的零增长”的进一步说明，笔者推测，这里的代际规模的零增长就是更替水平，就是净再生产率等于1的情况，而人口规模的零增长就是静止人口的零增长。如果笔者的理解与“李文”是一致的话，那么，代际规模的零增长和人口规模的零增长就必然是等价的。根据稳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公式，更替水平即净再生产率等于1必然推出增长率为零，反之亦然。其三，关于“只有在这种稳定均衡条件之下，一个人口才能真正实现适度人口规模与合理年龄结构的统一”的叙述，笔者以为，从上文可以推出这种稳定均衡条件就是静止人口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叙述就会与“李文”上段中所提出的“三对矛盾”相抵触，使前后文不一致。

“李文”从狭义人口学的角度审视了传统人口转变论的局限和不足，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很难把这些“局限”强加给人口转变论。如果非要弥补这些“局限”，超越人口转变论，使之成为所谓“后人口转变论”，那么，这门新理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数理人口学的翻版，或者是数理人口学在人口转变分析中的应用。所以，这种“超越”建立的“后人口转变论”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如果真要建立起超越人口转变论的新理论，笔者以为仅有狭义人口学的视角是不够的，而“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的角度是必要的。事实上，二战以后，西方学者从人口统计意义上对人口转变论的阶段划分、描述和研究逐渐趋少，因为，人口统计学上的“三段论”描述即高位均衡向低位均衡转变的描述，虽简单却有很强的概括性。西方学者对人口转变论的研究转向了解释和因果研究，如诺特斯坦把

工业化发展引入了人口转变的解释研究；寇尔则进一步补充了文化宗教、语言等对人口转变的影响；经济学家贝克则引进了理性人的分析框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孩子成本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伊斯特林则试图构建一种宏观与微观相联系的分析模型，解释生育率转变的因果原因。补充和不断完善的人口转变理论较前更有解释力。我国不少学者也从我国人口转变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西方人口转变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提出了一些能够解释我国人口转变的观点和见地。

4 余论：关于“后”的话语

在新学科层出不穷的新时代，以“后”为前缀的学说理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冲击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兴起了各种“后”学之风，如“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事实上，在这些名目繁多的派别中，贯穿其思想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和“后现代”问题。“现代”是指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它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主流。“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省和反叛，是对“现代”学说或理论研究范式的批判和重新建构。由此看来，无论是李建民，还是于学军都似有“后现代”的味道，都以一种新的标志来界定人口发展“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李建民在其“后人口转变论”中更是试图超越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重新建构“后人口学”理论。然而，如果本文上述的分析还算是言之有据的话，那么不能不说，李建民的“后人口转变论”没有形成对传统人口转变论的突破和超越，因此，“后人口转变论”并没有被实质性地建构起来，还仅仅是一个比较“前卫”的概念而已。

参考文献：

- 1 于学军. 中国人口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中国人口科学, 2000; 2
- 2 李建民. 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 南方人口, 2000; 2
- 3 蔡昉主编. 2000年: 中国人口问题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4 李银河. 生育与村落文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5 李建民. 后人口转变论. 人口研究, 2000; 4
- 6 顾宝昌.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7 (美)内森·凯菲茨. 应用数理人口学. 郑真真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8 陈卫. 中国的低生育率. 人口研究, 1995增刊
- 9 (日本)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研究所编. 日本与世界人口统计资料集 1998. 日本东京: 厚生统计协会, 1999
- 10 曾毅编著. 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翟振武 收稿时间: 2000- 06)

Querying the Po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po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s suggested by Dr. Yu Xuejun and Li Jianmin. Ha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ntered the “post-transitional stage”? Is the “po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 new development to the class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nd a new population theory is thus constructed? These are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is paper.

Li Jianxin is Ph.D.,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